

戰爭與華教：

作為「記憶之場」的檳城鍾靈中學師生殉難事件

高 嘉 謙^{*}

摘 要

檳城鍾靈中學是馬來亞時代校譽鼎盛輝煌的華校，在二戰檳城淪陷期間，鍾中8名教員，46名學生殉難，這是檳城知識界的痛史，標記為知識人的創傷及華教危機。鍾中教師在戰後透過歷史見證和創傷表述，倖存者的回憶和控訴，呈現的華校歷史傷痕，有其重要的象徵意義。戰後鍾中復校，成立鍾中紀念師生殉難委員會，追悼、立碑、出版榮哀錄，同時華文教師管震民撰述的詩歌、祭文、碑序，在紀史與抒情之間，替鍾靈師生殉難事件，啟動了歷史與文學的敘事能量。

本文借用法國史學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的理論，討論環繞鍾靈中學師生殉難而相繼形成的「記憶之場」（les lieux de mémoire），如何銘刻了斷傷斯文、斷絕文化的困境，進而負載華人精神的復興與賡續。在此意義上，鍾靈師生殉難作為「記憶之場」，已是民族記憶的一部分。當我們檢視戰爭記憶「文本」如何被建構，鍾靈師生的遭遇和災難，實際內嵌了華教與華人民族情感在新馬日侵歲月裡的連結。鍾靈受難校史的陳述與建構，恰恰是我們如何看待淪

^{*} 作者現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陷期間的華人集體記憶，尤其對華教構成的影響。而華文教師在戰爭前後的關鍵位置，投映了一代華文教師的文化本位和涵養。

關鍵詞：華校、檳城鍾靈中學、管震民、創傷記憶、抗日

The War and Chinese Education:

The Martyrdom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Penang Chung Ling High School as a “Field of Memory”

Chia-cian Ko^{*}

Abstract

During the fall of Penang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8 teachers and 46 students of Chung Ling High School died, marking the painful history of Penang's intellectual community and the trauma and crisis of Chinese education. After the resumption of the school, a committee was set up to commemorate the martyrdom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Chung Ling, and to memorialize, erect monuments and publish a book of grief.

Applying the theories of the French historian Pierre Nora,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the “field of mem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which was formed around the martyrdom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 of Chung Ling High School, has engraved the plight of the carving up of the culture and the severance of the culture, and in turn loaded the revival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Chinese spirit. In this sense, the martyrdom of Chung Ling's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a “field of memory,” is already part of the national memor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hen we examine how the “text” of war memory was constructed, the encounters and disasters of Chung Ling’s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in fact embedded 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hinese educ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 sentiment during the years of Japanese invasion in Malaya. The narrative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ung Ling’s school is precisely how we perceive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hinese during the fall, and the impact on Chinese education in particular. The critical position of Chinese teachers before and after the war is a reflection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ivation of a generation of Chinese teachers.

Keywords: Chinese school, Penang Chung Ling High School, Guan Zhenmin, traumatic memory, anti-Japanese

戰爭與華教：

作為「記憶之場」的檳城鍾靈中學師生殉難事件*

高 嘉 謙

一、戰火與華校

1941年12月8日，在日軍偷襲珍珠港的前一小時，發動了對馬來半島北方吉蘭丹州的攻擊，搶灘登陸並迅速在一天之後占領了此北方城鎮，大東亞戰爭由此掀開序幕。12月11日，日軍戰機空襲轟炸檳榔嶼，戰爭的死亡暗影首次籠罩在開埠以降的繁華島嶼。經過幾天的大轟炸，英籍官員、駐軍接連逃命，檳城陷入無政府狀態。由當地各民族派人自組的檳城服務委員會，暫時維持治安與秩序。但空襲濫炸並未停止，12月19日委員會只能向占領北馬的日軍司令部廣播英兵已撤，呼籲停止轟炸。當天日軍入城，正式開啟了三年八個月被殖民的淪陷歲月。

* 感謝審查人提供的審查意見、修訂建議使得本文更臻完善，謹此致上誠摯的謝意。此文初稿宣讀於2019年10月4-5日國立政治大學高教深耕「東亞文化傳統及其現代轉型」國際拔尖計畫與「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之「歷史記憶與概念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感謝潘宗億教授的講評意見。本文撰稿期間，助理劉雯慧、檳城劉雯詩小姐、檳城閱書報社協助查找、提供相關資料，謹致謝忱。

從18世紀海洋貿易時代以降，檳榔嶼（檳城）就是馬來半島北方占有戰略意義的重要小島。這個在1786年，早於新加坡開埠的英殖民重鎮，有著人文薈萃的華人移民社會，五大華人家族和英殖民外商成就了檳榔嶼繁華的商業規模，林立的華人會館組織、影響深遠的《檳城新報》、《光華日報》、中國南來文人雅士、革命維新分子聚集，是典型的南洋華人城市。然而，隨著新加坡於1942年2月淪陷，日軍接連在新加坡和馬來半島各州展開大檢證的肅清。其時檳城已被改稱「彼南」，4月在檳城發動的大檢證，華人首當其衝，經過慘無人道的人口肅清，受創甚深。其中著名的華校鍾靈中學校舍遭致破壞，尤其有多名師生被控以「抗日分子、共產黨」的嫌疑被捕，遭致拷問逼供，共有8名教員，46名學生遇害，¹ 知識分子噤聲避難。這是檳城知識界的痛史，重創當地華人社會。這段創傷記憶，因而成為「彼南時代」深刻烙印的殺戮與破壞。

翻查記載新馬日侵歲月的相關中文專著，大部分都談及了鍾靈中學員生殉難的事件，以此作為「三年八個月」的血腥見證之一。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編《大戰與南僑》（1947）載錄王世毅〈鍾中教員殉難記〉以刻畫知識分子的死難；許雲樵原編，蔡史君編修《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1984）則有汪洋（汪開競，1912-1976）〈鍾靈中學員生殉難記〉專章。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二文均屬鍾靈中學教師的見證書寫。爾後陸培春編著《日本軍政下的馬來亞》（2005）、《日本侵略馬來亞歷史圖集》（2015）都記載了「慘絕人寰的鍾靈師生命案」。在鍾靈中學的校史呈現而言，幾乎每隔十週年的校慶紀念特刊，鍾靈師生殉難的紀念文章總是重點論述，尤其鍾靈中學90週年校慶之際，校史工委會「有感於母校在日本侵占期間，許

¹ 根據鍾靈中學編輯的《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1947）的名錄記載，師生殉難者共有8名教師，學生46人。目前所見各種研究成果，偶爾有誤寫師生46人，或分為教師8人、學生38人等計算方式。本文以為根據離歷史時刻最接近的鍾靈中學編纂之《榮哀錄》最為可靠。

多學長們投身於轟轟烈烈的抗敵運動」，² 從抗日事蹟擴大為全面校史的綜合論述。而當中王慷鼎教授撰述長文〈董教學三位一體的抗日運動（1937-1945）〉，³ 完整綜述了鍾靈中學在日侵前後的角色。陳是呈則是少數以馬來語撰述鍾靈中學經歷大檢證事件的學者。⁴ 換言之，鍾靈中學員生殉難是校史難以抹滅的一頁，自然也成了檳城在淪陷歲月的集體記憶。

相較於新加坡和馬來半島其他州屬在大檢證遭遇的大規模屠殺，檳城鍾中事件不是最血腥的一頁，甚至有些專著處理日侵新馬歷史並無著眼鍾靈師生殉難。⁵ 日侵初期，華校校舍、圖書被日軍蓄意毀壞多有所聞，⁶ 然而，鍾中事件在戰後卻是以知識分子的死難，標記為馬來亞淪陷時期深刻的華人歷史記憶——知識人的創傷及華教危機。對於華教危機的解讀，既指向了華文教育的文化賡續理想，同時亦可視為華人民族精神內部的文脈或載體。就檳城的華人淪陷經驗而言，鍾靈師生殉難在象徵意義上受到矚目。其中鍾中教師在戰後透過書寫的歷史見證和創傷表述，倖存者的回憶和控訴，恰恰是一奠基於當下情感的創傷性歷史記憶。爾後鍾中復校，追念為教育犧牲者，成立鍾中紀念師生殉難委員會，追悼、立碑、出版榮哀錄，同時華文教師

² 黃國良：〈後記〉，收於陳榮照主編：《檳城鍾靈中學校史論集》（新加坡：鍾靈中學〔新加坡〕校友會，2007年），頁451。

³ 王慷鼎：〈董教學三位一體的抗日運動（1937-1945）〉，收於陳榮照主編：《檳城鍾靈中學校史論集》，頁284-363。

⁴ Chee Seng Tan, “‘Sook Ching’ 1942 Dan Penglibatan Sekolah Menengah Chung Ling Pulau Pinang: Suatu Interpretasi Baru,” *Kajian Malaysia* 37, no. 1 (2019): 51-82.

⁵ 林水椽、駱靜山編：《馬來西亞華人史》（雪蘭莪：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1984年）。Andrew Barber, *Penang at War 1914-1945* (Malaysia: AB&A, 2010).

⁶ 日侵歲月，育才、中化、尊孔、培華等幾所華校遭致惡意破壞，可看出日軍把華校當作發洩仇恨對象。除了鍾靈中學師生大規模殉難，其他華校亦不乏師生或教育界人士被害，例如馬六甲培風中學、森美蘭芙蓉的中華中小學，可惜沒有完整的統計。參見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史》第二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1999年），頁412-415。

管震民（1880-1962）撰述的祭文、碑序，進而填詞的〈復興歌〉、〈追悼會歌〉，以及為「檳榔嶼華僑抗戰殉職機工暨罹難僑胞紀念碑」撰寫紀念歌，在紀史與抒情之間，替鍾靈師生殉難事件的敘事，啟動了歷史與文學的能量。

另外，管震民個人在淪陷期間遭遇的家庭厄運，他筆下紀錄日侵歲月的舊體詩歌沈鬱糾結、力透紙背，仿如一頁心史，呼應著華校師生的劫難。借用法國史學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的理論，以上種種涉及借用物質與非物質性的記憶形態，可視為環繞鍾靈中學師生殉難而相繼形成的「記憶之場」（les lieux de mémoire），一個馬來半島華教運動和華校記憶的凝結點。如同諾拉所指出的，記憶之場的存在和維繫，端賴於創建檔案、維持週年紀念活動、組織慶典、發表葬禮演說、對文件進行見證。因為沒有紀念的意識，歷史很快就會清除一切，讓處於演變的記憶掃蕩一空。⁷ 淪陷時期的鍾靈劫難，指向人命的殺戮、創痛、倖存，更銘刻了斷傷斯文，斷絕文化的困境，進而負載華人精神的復興與賡續。在此意義上，鍾靈師生殉難作為「記憶之場」，已是民族記憶的一部分。當我們檢視上述戰爭記憶「文本」如何被建構和不斷重構，卻不能忽視，鍾靈中學作為戰前馬來亞首屈一指的華校，鍾靈的遭遇和災難，內嵌了華教與華人民族情感在新馬日侵歲月裡的連結。鍾靈受難校史的陳述與建構，恰恰是我們如何看待淪陷期間的華人集體記憶，尤其對華教構成的影響和召喚，尤其這段歷史記憶所塑造的華人民族情感與精神，對照戰後的1950年代鍾靈中學面對的改制和學潮，隱然成了對母語教育情結的動員和凝聚力。而華文教師在戰爭前後的關鍵位置，其如何投映了一代華文教師的文化本位和涵養，以及在戰時的遭遇，藉此作為華教記

⁷ 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主編，黃艷紅等譯：〈記憶與歷史之間：場所問題〉，《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0-11。另有繁體版譯本，皮耶·諾哈（Pierre Nora）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臺北：行人文化，2012年）。筆者以為「記憶之場」較精確指稱本文所表達的概念，故引述以簡體版為主。

憶共同體參照的「場」(sites)，呼應著鍾靈師生殉難事蹟，值得探究。

二、戰前與戰時的華文教師／華文想像

馬來亞和新加坡新式教育的興辦，跟晚清政治在海外的維新和革命運動休戚相關。20世紀初期，革命黨人已在檳城耕耘甚深。鍾靈中學的前身為鍾靈學校，創辦於1917年。當時中國境內討袁運動失敗，國民黨人意識到興學是救國之道，而追隨孫中山(1866-1925)的檳城閱書報社革命華僑邱明昶(1873-1945)、許生理(1886-1967)、陳新政(1881-1924)等人，響應教育新時代青年，設立了兩等小學(初小、高小)的鍾靈學校。「鍾靈」二字，取鍾靈毓秀之意。至到1923年開辦初中，成為馬來半島第一間華文中學，正式更名為鍾靈中學。⁸該校董事、師生的民族情懷，因而跟國民黨政治立場接近，入黨師生不在少數。革命派人士開辦學校，影響廣泛，爾後新式學校如雨後春筍般在各城鎮華人區內設立，成為中華文化傳播的新據點，兼及對在地出生的華人形塑國家、民族與文化認同。

回顧新馬兩地對華文教育與文化的最初落實和想像，其實必須注意到19世紀末清朝使節的派駐，以及世紀之交的孔教運動。1881年左秉隆(1850-1924)到新加坡領事館擔任首位派駐領事，配合私塾書室的設立，組織文社，發起徵文，評選優異，在報刊公布課題和得獎名單，儘管仍不脫四書五經的傳統教化議題，但在以官方訊息和新聞導向為主的報刊裡，另創造了一個文學場。1891-1894年接任領事的

⁸ 1919年檳榔嶼華僑中學創辦，是馬來半島第一所中學。但不到兩年因經費不足而關閉。華僑中學於1921年停辦後，星馬兩地的華文中學僅有星洲的華僑中學。故1923年鍾靈中學開辦初中，可視為當時馬來半島的第一所中學。葉鍾鈴：《檳城鍾靈中學史稿(1917-1957)》(新加坡：華裔館，2009年)，頁15-25。陳榮照：〈春風化雨四十年：鍾靈1917-1957〉，收於陳榮照主編：《檳城鍾靈中學校史論集》，頁1-45。

黃遵憲（1848-1905）創辦「圖南社」，依循徵文評選的作法，題目更接地氣，展現對南洋在地的關懷。使節、文社和報刊，可以視為文學建制的一環，同時也是一套華人移民社會的教化機制。在接續的二十年內，學堂、書室、報社、出版、孔教運動蓬勃興起，改變了新加坡和馬來半島華人社群面貌，形塑了移民社會內的新興知識階層和文學教養。在黃遵憲任內，促成海峽殖民地的檳城設置副領事，僑領張弼士（1840-1916）為首任第一副領事。張弼士推動華文教育不遺餘力，1904年創辦了檳城第一所華文學校——孔聖廟中華學校，既是接續了當地孔教運動的環節，也是馬來半島第一所使用中國「官話」（國語、華語）為教學媒介語的新式教育學校。⁹

領事肩負的政治與文化身分，凸顯了外交與教化任務的能動性，讓新馬華人對領事角色、中國情感和文化教養因此有了新的想像。從這個角度而言，新加坡和檳城領事主要改變了一個移民社群的流寓生態，開啟了一個「華文」的在地現場。那不僅是海外華人的意識形態認同，恰恰有文化與文學的交織空間，讓「華文」扎根。其時晚清維新派人物陳熾（1855-1900）倡導的南洋視野，其實說明了領事跟華文教育之間的隱約關係。陳熾各種主張增設領事、大興海外商埠的言論，處處都提及在華人社會設置學堂的重要性。其中提及「以設官開其始，以立學考其成。不爭旦夕之功，不惜度支之費，而惟以潛移默化，收效將來，使數百萬之華民智慧漸開，才能漸出，則有人有土，有土有財」、¹⁰「西人皆學而華人不學，故終為人役耳。歲費數萬金以羅海外之才，以待歐西之變，他日必有奇才碩彥應運而生，為海上

⁹ 相關研究可參考鄭良樹、張曉威的研究。關於此學校跟孔教運動的關係，最新研究成果可參廖小菁：〈近代南洋的孔教運動與華文教育：以檳榔嶼孔聖廟中華學校為中心的考察（1904-1923）〉，收於呂妙芬、康豹主編：《五四運動與中國宗教的調適與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0年），頁193-236。

¹⁰ 陳次亮：〈酌增領事說〉，收於張煜南輯：《海國公餘輯錄》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162。

之夫餘以藩屏中國者。」¹¹ 整體的教育布局，著眼清廷的外交地緣政治。1905年以降，清政府派學部官員赴南洋視學更為頻繁，曾有一批口操廣西官話的桂林教師南來進行官話教學，形成早期新馬混雜粵腔與福建腔的「華語」。¹² 然而不能忽視的是，在海峽殖民地，華人社群對教化或文學教育的熱情和需求，卻同時揭示了一個華夷雜處的社會存在的危機與斷裂。華人對中華性（Chineseness）的在地接受和實踐，可溯源自領事派駐、孔教運動、華文學校的設立。華人民族主義與文化情感交相激盪，在日趨壯盛的新馬華人社會裡，指陳了「華文」不僅僅是一種五四新文化和新式教育傳承而來，標榜現代性精神的國族想像，卻同時是華文教育體制內對中華文脈的一種繼承和想像。

從19世紀末開始，檳城已是人文薈萃，力鈞（1855-1925）的《檳榔嶼志略·藝文志》和張煜南（1851-1911）編纂《檳榔嶼流寓詩歌》，記載了他們彼時所見的南來風雅。在一般的文士商賈之外，駐留者不乏文化名人，如避難的康有為（1858-1927）、末代帝師陳寶琛（1848-1935）、章太炎（1869-1936）、丘逢甲（1864-1912）、邱菽園（1874-1941）、徐悲鴻（1895-1953）等人。除此，《檳城新報》（1895-1941）、《光華日報》（1910-迄今）、《星檳日報》（1939-1941）的報人，或私塾學校裡的教師，他們或留有詩文、畫作，或刻留在會館、宗祠、廟宇、公塚、學校裡的墨寶，如匾額、對聯、碑刻，¹³ 以及戰前成立的鴻雪廬詩社、檳榔吟社，報刊裡設置的

¹¹ 陳次亮：〈南洋論〉，收於張煜南輯：《海國公餘輯錄》上冊，頁145。

¹² 關於清官員推動南洋教育，參見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史》第一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1998年），頁69-90。至於兩廣總督岑春煊派遣桂林教師南來進行廣西官話的教學，論者視其為馬來亞「華語」的緣起。參見甘德政：《我們是誰？中英博奕與馬來亞華人的身份認同》（吉隆坡：Kam De Zheng，2016年），頁196-199。

¹³ 關於檳城的墨蹟掌故，參見張少寬：《檳榔嶼翰墨緣》（檳城：南洋田野研究社，2017年）。

詩詞專號，如同藝文光譜，締造了檳城早期的文學和文化生態。¹⁴ 相對短期過客，落地生根卻有心志寄託於詩心墨骨者，終將化為檳城華人文化的一方土讓。這道「碧瀾風雅」，¹⁵ 作為檳城華人文化的濫觴，亦屬廣義「華文」意識的扎根與萌芽，為華人社會積累底蘊。

戰前檳城鍾靈中學任教的幾位華文教師，其中留有舊體詩詞遺世的就有汪起予（1880-1939）、陳少蘇（1885-1943）、管震民、李詞備（1904-1942）、謝松山（1881-1965）、李弼師（1902-?）等人。這顯然不足為奇，但值得重視。華校裡這些具備古典詩文教養的華文教師，可看做一線斯文的延續，締造了鍾靈中學文風和檳城興盛的詩風。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24-1925年間，初中剛開辦，鍾靈中小學合計的華文教師僅有3-4位，要到1938年高中有了第一屆畢業生，華文教師人數也增加至23位。¹⁶ 這是戰前華文教師人數最多的一年，除了反映學生人數增長，大概也因為中國啟動全面抗戰，南來避難者頻繁，因應本地土生土長的華文教師欠缺，南來教師遂成了華文教學的主力。¹⁷ 除此，華文科目亦受到更大重視。1936年，在校方的學科成績規定裡，國文（華文）一科學年成績不及格，就算其他科均獲及格，仍不得升級或畢業。¹⁸ 華校和華人對華文的凝聚力，多少回應了華人抗日聲援時期的情感動員，尤其各種抗日戲劇的搬演、抗日愛國歌曲和中國合唱團南來巡迴宣傳抗日、籌賑祖國難民的演出，無

¹⁴ 從清末到戰前，活躍的詩人群體，參見張少寬：〈二戰前的舊詩人〉，《檳榔嶼舊聞》（檳城：Federation of Ka Yin Chu Association of Malaysia，2016年），頁228-230。張少寬：〈檳城詩壇舊事〉，《檳榔嶼舊聞》，頁241-244。

¹⁵ 「碧瀾」是檳城的閩南諧音，出自王韜《漫遊隨錄》。參見張景雲：〈碧瀾風雅遺韻長〉，收於張少寬：《檳榔嶼翰墨緣》，頁X-XVI。

¹⁶ 王慷鼎：〈文采風流的華文教師〉，收於陳榮照主編：《檳城鍾靈中學校史論集》，頁110-164。

¹⁷ 根據王慷鼎的統計，戰前到任的華文教師，33.7%為中國出生，僅有5.6%為本地出生。南來教師在戰前到任者又數江蘇、福建籍貫者居多，相對戰後到任者為廣東、福建居多。參見前註，頁115-116。

¹⁸ 〈檳城鍾靈中學近況〉，《僑務月報》第3期（1936年），頁12。

形之中助長了對華文的熱情，以及箇中的民族情操。

戰前教師基本屬於南來文人，詩詞世界裡往往寄存他們身處炎荒，望向故鄉烽火，進退無據的客愁。陳少蘇是1923年接任鍾靈中學國文教師，屬於最早一批的華文教師。在告慰友人詞作裡，最能看出這些南來文人在羈旅途上的複雜胸懷。

摸魚兒 陋齋兄因家信催歸，泫然久之，作此告慰

陋齋云家書讀罷，頓增新愁千縷。簫聲冷落檳榔市。悔作十年羈旅。吾與汝，俱一樣，怕聞杜宇催歸語。征鴻何許，望親舍白雲，鄉關烽火，都是斷腸處。 矯情似，溫嶠絕裾態度，容於晉室何補！南渡書生曾何得？只有征塵如霧。君莫苦，莫誦夢中慈母傷心句，安排歸去！待收拾奚囊，細聽津鼓，重話來時路。¹⁹

這闕詞直指彼時日侵中華，烽火連天，中國抗日戰爭掀開序幕。南來的友人心繫家國故人，心情悵然。與此同時，陳少蘇給同校華文教師管震民的詩集《蘆管吟艸》題詞，選擇詞牌〈滿江紅〉，上闕如此開篇：

感喟蒼涼，有光燄凌空千尺；看筆底江關詞賦，怎般淒惻。杜老憂時傷故國，放翁入蜀思前敵，知先生悲憤露毫端，抒胸臆。²⁰

《蘆管吟艸》的詩作成於1937-1938年，既是中國抗戰熱烈，新馬兩地華人的民族情感受到極大感召之時。這些南來教師遠在赤道島嶼，激盪情懷可想而知。因而詩詞作為媒介，彼此共享的時代悲憤，開啟既有離散情思，又是感時憂國的南島文脈。

¹⁹ 陳少蘇：〈摸魚兒〉，《生春堂集》（檳城：檳城鍾靈中學校友會，1947年），頁11。

²⁰ 陳少蘇：〈滿江紅〉，《生春堂集》，頁10。

這不僅是華校教師的個人情感。當時鍾靈師生參與各種抗日援華運動頗為熱烈。盧溝橋事變後的一個半月，檳城籌賑會率先成立，由鍾靈中學校董領導。這是檳城閱書報社的策劃和號召，其做為鍾靈學校的創辦單位，彼此交織的社會網絡可看出對華人社會動員能量。當時各種籌賑活動包含義捐、義演、義賣、義賽、購買公債等，參與者不僅有鍾靈師生，校長陳充恩（1901-1952）甚至擔任籌賑會的宣傳組主任，推動各種抗日救亡的宣傳工作。校董、教師擔任講演團講員，以各種方言向華人社群講述抗戰形勢和救亡之必要；鍾靈中學銅管樂隊參與機工回國服務的歡送隊伍，學生沿街勸募、演劇、歌唱；校友會參與《雷雨》演劇籌賑，發行《鐘聲》會刊鼓吹抗日救亡意識。除此，教師葉遂安（1914-1940）、許啟泮（1913-1941）等人甚至積極北歸從戎，投入中國的抗日戰場。換言之，論者眼中董教學三位一體的援華抗日事蹟，²¹ 不僅是鍾靈中學的榮耀，亦屬檳城華人民族情感的最大凝聚。在抗日年代，華人左派勢力隨之壯大，馬來亞共產黨組織亦滲透學生群體，鍾靈學生陳青山（1919-2003）、楊果（1918-1956）、鍾晉康（1920-1942）等人參與馬共的抗日勢力，多方串聯抗日活動。他們有的被英殖民政府驅逐出境，有的成為戰時領導抗日的馬共領袖。²²

在檳城的抗日運動裡，鍾中華文教師管震民在一片響應中國抗戰的熱潮裡，留下不少記載彼時華人群情激昂，民族意識高漲的詩篇。管震民，浙江台州府黃岩人，1934年12月南渡檳榔嶼受聘於鍾靈中學。他偕同詩友許曉山（?-1945）推動檳榔吟社，開篇就是豪壯語：

新潮澎湃逐波來，束關經書等劫灰。誰續廣陵散亡曲，炎荒尚有不遺才。

²¹ 相關援華抗日的活動和事蹟，參見註解3。

²² 郭仁德：《馬新抗日史料：神秘萊特》（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頁51-54。謝詩堅編著：《檳城華人兩百年》（檳城：韓江學院韓江華人文化館，2012年），頁117-132。

救亡聲浪溢南天，莫說騷壇可寂然。慷慨悲歌逢此日，也隨筆陣舉吟鞭。²³

然而在常見發揚蹈厲的詩詞外，管震民的〈扶桑閨怨四絕〉則另起爐灶，從閨怨的傳統，摹寫日軍戰士眷屬的憂慮和疑惑，試圖從陰柔的閨怨視角，解構戰爭的強暴和陽剛。

驚聞禍水起蘆溝，手製征衫淚暗流。火急皇軍求速戰，千人針裡惹千愁。

三月亡華夢已休，今逾三載尚悠悠。望夫富士山頭上，只見煙霾古燕幽。

骨灰滿載付歸舟，不識兒夫身在否。祇怪昨宵魂夢裡，鴛鴦也自各分頭。

大和魂已冷如秋，舉國同聲唱倒矛。獨守深閨生趣盡，離人夫婿即吾讎。²⁴

鍾靈中學華文教師的詩詞篇章，偶有客居的憂患，然而抗戰的激憤、鼓動的民族情感呼求了一個時代的感受。這不妨可看作南來華校教師在新馬淪陷前後的自我定位。在此前，他們處身英殖民地的華文教育系統內，不乏中華民國教育部的派員視察和關懷，採用中國出版的教科書，常有「反英」、「反日」的教材，²⁵形塑和養成的中華認同與情感自不在話下。但殖民地政府對華校的津貼遠比政府學校更少，²⁶資源分配相對不均，因而華人兒女送入華校習華文，除了母

²³ 管震民：〈檳榔吟社成立紀念四首〉之一、二，《綠天廬吟艸》（檳榔嶼：管震民先生七秩榮壽紀念壽管委員會，1949年），頁1。

²⁴ 管震民：〈扶桑閨怨四絕〉，《綠天廬吟艸》，頁4。

²⁵ 關於戰前華文學校的狀況，可參見陳翼經：〈檳州百年來的教育〉，《檳州華人大會堂慶祝成立一百週年·新廈落成開幕紀念特刊》（檳城：檳州華人大會堂，1983年），頁398-405。

²⁶ 中國社會學者陳達於1934-1935年間在馬來亞考察，記載了海峽殖民地每年對華校的津貼僅4萬元，政府馬來學校則有60萬元。參見陳達：《浪跡十年之閩粵、南洋記聞》（香港：香港中和出版，2021年），頁97。

語情結，另勾勒了民族情感的動員。由此而觀，華校教師融入於援華抗日的風潮裡，詩文世界的華民族意識，更展現了一種對文字力道的堅定信仰。

爾後日本發動的大東亞戰爭波及新馬，以疾風怒濤之勢攻陷馬來半島北部防衛重要城鎮，英軍遭遇慘敗。日軍在不損一兵一卒的情況下占領檳島，彼時奉派攻占馬來半島的日軍作戰主任辻政信（1902-1961）帶有幾分自豪和抒情的筆觸，寫下了踏上檳城的情形：「在山麓的極樂寺裡，過去東鄉平八郎、乃木希典將軍遊歷時簽名的匾額，彷彿迎接我軍到來似地高高懸掛著。」²⁷ 然而，淪陷的三年八個月，管震民的個人遭際幾近家破人亡，詩裡的控訴和記載斑斑血淚，卻又傲骨凜然。

飛鳶陣陣布天空，彈似連珠聲更隆。三九齊攻先鬧市，萬千遭劫首華宗。游魂到處燐成碧，淚血交流色映紅。倒屋傾牆餘燼末，將軍何日策平東。²⁸

江湖憂患逼殘年，霜雪層層上鬢邊。文字無靈空有恨，英雄末路孰相憐。能餘熱血還忘老，快著先鞭早讓賢。夜不成眠何所事，起拈枯管寫吟牋。²⁹

江山破碎力難支，惶恐灘吟惶恐詩。獨抱忠魂酬故主，高歌正氣痛窮時。³⁰

這些淪陷時期的日常，我們不能僅視其為一己際遇的哀嘆。當時鍾靈校政停擺，校舍封禁，遭竊破壞嚴重。日本憲兵隊對華校生的認知

²⁷ 辻政信：《東方直布羅陀爭罷戰：日本如何完勝大英帝國》（臺北：燎原出版，2020年），頁172。

²⁸ 管震民：〈辛巳十二月十一日，日敵飛機二十七架分三隊首炸檳嶼，慘不忍睹，感賦二律〉其一，《綠天廬吟艸》，頁7。

²⁹ 管震民：〈不眠並示楚客〉，《綠天廬吟艸》，頁17。

³⁰ 管震民：〈和曼沙讀文山詩有感元韻〉其一，《綠天廬吟艸》，頁9。

是：其親中與抗日的態度遠甚於印度裔和馬來裔。他們對華校破壞，對中文書籍的檢測和焚燬，以及透過「肅清」行動抓拿華人共產黨和抗日分子。³¹ 除此，日軍還逼迫新馬兩地華人籌募繳納五千萬叻幣的「奉納金」，檳城一州就負責七百萬元，但籌措困難，最終只能靠日本銀行貸鉅款渡過難關。³² 這些針對華人的毀學、捕殺和財產搜刮，使得戰爭對華人的巨大傷害遠甚於其他種族。在獨尊和強勢推廣日語政策的淪陷時期，華校和華文教師所象徵的文脈，如同管震民筆下的喟嘆：「文字無靈空有恨，英雄末路孰相憐」。

在1942年4月間的日軍大肅清行動中，鍾靈師生更首當其衝，全校八名教師，四十六學生被酷刑逼供，罹難犧牲。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鍾靈華文教師數人難逃凶險，有的酷刑致死，有的憂患餘生。汪起予早在新馬華人熱烈支援中國抗日風潮裡逝世，管震民兒子管亮工（?-1942），是鍾靈中學體育教師，亦在被捕的鍾靈中學教師群裡，獄中絕食而死。管震民的妻子、孫女同時病逝，憂憤異常。陳少蘇聽聞鍾靈師生被日軍逮捕毆打，營救無門，結果積憤成疾，1943年病逝。李詞傭經歷最慘，在鍾靈師生被捕期間，死於獄中刑求。另外，寫作舊詩與新小說的饒百迎（1900-1943），被捕入獄，酷刑折磨後釋出，隔年病故。

華文教師的戰時際遇，勾勒了他們在抗日援華，以及淪陷落難過程背後集結的「鍾中」抗日精神。華文教師的詩詞，既是個人憂患，也投映了華校師生在戰時的生存環境，以及背後積累的民族精神。曾任鍾中華文教師的謝松山在戰後寫作《血海》（1950）處理戰爭與戰後審判經歷的竹枝詞，³³ 而汪開競寫作〈鍾靈中學員生殉難記〉（1946）的追憶文章，援引鍾中資深華文教師汪起予激昂詩作題辭：

³¹ Barber, *Penang at War 1914-1945*, 89-93.

³² 李業霖主編：《奉納金資料選編》（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0年），頁8、63。

³³ 相關研究成果，參見林立：〈亦詩亦史：描述新加坡日佔時期的舊體詩集《血海》〉，《清華學報》新47卷第3期（2017年9月），頁547-589。

劍氣凝虹白，曾磨十萬橫。青紗連帳隱，墨水旅魂驚。慷慨歌三戶，焚沈激眾生。黃龍終直搗，有酒快同傾。³⁴

「劍氣」一聯指向年輕人磨礪才氣，「青紗」一聯則用了「青紗障」典故，以東北高粱等農作物彷彿如高而密的青紗屏障，藏匿盜賊，藉此影射四處危機下，驚擾著年輕學子的求知之旅。詩人期許學子堅守鬥志，用了「三戶亡秦」的典故，集結楚遺民之力，必能滅秦。因此，「慷慨」接續的二聯，強調就算力量微薄，只要有決心，最終必能直搗黃龍，取得勝利。汪開競在記敘師生殉難事蹟，激勵人心的依然是強調鍾靈師生救國犧牲的意志。種種書寫的脈絡，締造了時代印記：華校所形塑之「華文」想像，已是華人情感政治的「痛史」，其結合戰前的愛國情操，以及戰時的創傷苦難。舊體詩詞作為文脈的一環，恰似「華文」的原力（the Force），在戰後鍾靈中學展開祭文、悼歌、碑記的紀念儀式裡，發揮文字能量，悼念校史上血淚的一頁。這是透過一連串儀式催生的「記憶之場」，在時空變化的今日，這些歷史留下的記憶標誌，對於華教記憶而言，像是「失落的記憶的有意識的、有組織的分泌物」，³⁵ 成為華人群體對華教認同與歸屬的象徵。

三、鍾靈師生殉難：詩與史的傷痕寫作

這段師生殉難的歷史，最初由戰後的倖存者之一，鍾靈中學華文教師張叔英（1894-?）、數學教師王世毅於戰後的1945年11月，先後在不同報刊披露鍾靈師生的蒙難經過。王世毅〈鍾中教員殉難記〉，幾乎紀實陳述鍾靈師生被捕的時間，詳記人名，逼供經歷，獄中同事

³⁴ 汪洋：〈鍾靈中學學生殉難記〉，收於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編：《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檳城：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1947年），頁23。

³⁵ 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主編，黃艷紅等譯：〈記憶與歷史之間：場所問題〉，《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頁14-15。

的際遇，以及出獄後掌握的同事死難消息。歷經九死一生的遭遇，王世毅和黃峇福為少數被捕的倖存者，這段紀錄實有見證的意味，為死者鳴冤，也為鍾靈中學的劫難尋求超越的意義。王世毅如此寫到：「現學校開學在即，被難全人十名，惟黃君與余尚健在，劫後餘生，仍得繼續為本校服務，真可算萬幸了。」³⁶

我們再看張叔英〈鍾靈中學師生蒙難記〉的血淚控訴：

當日寇準備南侵之際，早有特工人員網布各地，鍾中師生平時之領導救國工作，已為日寇洞悉。登陸之日，日寇故不聲張。直至翌年春，敵憲開始搜索，由新加坡漸及北馬。迨四月初，檳城被檢，鍾中即為其主要目標。一頁慘痛之血史，就此開端。時鍾中教職員已多先期離檳，惟尚有十一人留校，一日深夜，悉被圍捕入獄，灌水，炙燭，上電，飼狗，釘手足……濫施毒刑，慘絕人寰。結果，不屈而死者，有李詞備、管亮工、朱宣儀、柯梓桐、林振凱、簡德輝等六烈士。其餘五人拘禁三月餘始釋。查企唐出獄後，以傷重，昏倒途中而死，饒百迎不久亦告不治，僅王世毅、黃峇福、梅英榮三人，得回家調養，重慶更生。全校學生及工役被捕者，亦達數百人，而死者幾及其半。殘暴日寇，竟將鍾中師生一網打盡，而校具亦毀劫一空，以洩獸憤，言之痛心！

今者，暴敵屈伏，天日重光，秩序漸復舊觀，而鍾靈中學亦從事修葺校舍，定本年十二月八日正式復校開學。回憶四年前之同日，正暴敵南侵之時，予任鍾中秘書職，僅以身免，痛定思痛，淚涔涔下也，是以記之。³⁷

³⁶ 王世毅：〈鍾中教員殉難記〉，《中華公報》，1945年11月28日。轉載自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編：《大戰與南僑》（吉隆坡：隆雪中華大會堂，2007年），頁100-101。

³⁷ 張叔英：〈鍾靈中學師生蒙難記〉，《申報》，1945年11月26日。

以上兩篇記錄，大致詳述同仁受難經歷，卻同時總結了日軍早已鎖定鍾靈師生的抗日援華的背景，鍾靈師生遭遇劫難，實跟華人抗日的民族情懷脫不了關係，尤其在「暴敵屈伏，天日重光，秩序漸復舊觀」之際，復校不忘處理創傷經驗，尤其淪陷期間死難者眾，消息混沌不明。戰後的調查顯得急迫，「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成立，為傷者、亡者伸張正義，也為鍾中歷史銘記傷痕。1947年1月鍾靈中學整理受難紀錄，出版《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紀念性的見證與紀念儀式隨即啟動。其中更詳盡的肅清前後的各種營救、獄中見聞等紀錄，當屬華文教師汪開競〈鍾靈中學員生殉難記〉。他根據被捕而倖存同仁的口述史料整理，同時指出鍾中兩位資深華文教師陳少蘇憂憤而終，管震民家逢巨變，均屬戰時鍾中的受難經歷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汪開競以依藤為筆名，在1957年9月出版《彼南劫灰錄》，³⁸以散文敘事，兼具史筆，替檳城的淪陷歲月留下珍貴的蒙難實錄，同時編入《鍾靈叢書》系列。此書出版適逢馬來亞聯邦獨立，卻同時是鍾靈中學接受政府津貼，率先掀開華校改制的序幕，全馬華人社會譁然，學潮應運而生。華教與政治之間的關係緊張，日據檳城的血淚回憶，隱然遙接鍾中於戰時的傷痕，亦有寄寓眼前的變故。戰爭、華教與民族情感，構成了思考新馬華人精神結構的一個側面。

鍾靈復校之初，梳理蒙難史實之餘，追悼忠烈亡魂，刻畫受難心曲，是撫平傷痕的必然儀式。但啟動歷史記憶之際，值得關注的當屬舊體形式的辭賦、詩詞和文章，如何作為「華文」想像的一環，形塑為歷史記憶的一部分。其時華文教師管震民擅於詩詞，有「北馬詩翁」之譽，跟當時鍾靈中學同屬華文教師的汪起予、陳少蘇並稱「鍾靈三老」。詩詞向來是風雅文化，然而，危機時刻的詩詞寫作，恰恰遊走於見證的紀實，抒情的激憤，展現為憂患的文化力道。檳榔嶼淪陷，華人社會過往的援華抗日成了被占領期間的恐懼，尤其以針對性

³⁸ 依藤：《彼南劫灰錄》（檳城：檳城鍾靈中學，1957年）。

的大檢證中對華人知識分子的傷害影響最為深遠。管震民是當中受害者的眷屬，亦屬時代災難的倖存者，兒子管亮工同屬鍾靈中學教師，負責體育課程，亦參與訓練抗日機工。³⁹ 新馬抗日援華的顯著功績，當屬1938-1939年間徵募3000餘名南洋機工回到中國，參與滇緬公路的戰時運輸。⁴⁰ 南洋機工是新馬抗日籌賑的戰時華人動員的重要記憶，熱血激情的集體記憶。管亮工因此被檢舉與拷問，在檢證中終難逃一死，管震民筆下的戰爭書寫，藏有喪子的遺恨。這是鍾靈師生殉難事件裡，受難者家屬的創傷寫作。換言之，喪子之痛，不僅是個人層次的創傷，而是以鍾靈中學為主的華校生遭遇的苦難為覆蓋，細緻勾勒了檳島在戰時瀰漫的恐慌。論者提醒創傷記憶往往餘波蕩漾，不限於一家一戶或一時一地，因而「創傷對於個人和集體都是令人無法磨滅的歷史殘蹟。記憶正好現這種殘蹟。」⁴¹ 這正是我們理解管震民以「焚坑」作為關鍵意象，求索歷史上對知識人之暴力典故，盡訴檢證之殘忍無情，凸顯華人或華校知識分子的生命的脆危性（precariousness）。這既是一種在淪陷時期社會性生存狀況受他人掌控之事實，卻也預設了其可堪哀悼的特質與資格，強調逝者的生命乃是生存的權利和合法性。⁴² 管震民的詩如此控訴：

積悶填胸掃未清，苦無竹葉解餘醒。突聞令下嚴搜檢，樹上烏鴉亦噤聲。

³⁹ 關於管亮工參與南洋機工訓練事蹟，參見葉鍾鈴：〈檳城華僑機工回國服務紀實〉，收於陳劍虹、黃賢強編：《檳榔嶼華人研究》（檳城：韓江學院華人文化館，2005年），頁316。

⁴⁰ 關於機工的相關研究，參考葉鍾鈴：〈南僑籌賑總會徵募機工回國服務史實〉，《陳嘉庚與南洋華人論文集》（吉隆坡：馬來西亞陳嘉庚基金工委會，2013年），頁36-86。

⁴¹ 李有成：《記憶政治》（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20年），頁36-37。

⁴²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著，何磊譯：《戰爭的框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55-59。

通衢小巷斷人行，蒙馬虎皮眾目驚。祇恐當前頭一點，便將粉筆背書名。

犢子偏遭獠犬傷，無情縲綆肆摧戕。西河有淚從何灑，誰辨平生是俊良。

荊天棘地欲何之，檻鶴籠猿祇自悲。跬步不離防觸阱，鍾靈二字怕人知。⁴³

若說大檢證是日軍針對華人和華校生的殘暴苛虐和殺戮，實際的原因可理解為鍾靈中學作為淪陷前援華抗日的重要基地，亦被簡化認定為馬來亞共產黨抗日勢力滲透的大本營，華校生的抗日精神和作為了日軍的芒刺，無論在淪陷前後。⁴⁴ 詩裡刻畫了檢證過程的某種死亡的殘酷和機遇：「通衢小巷斷人行，蒙馬虎皮眾目驚。祇恐當前頭一點，便將粉筆背書名。」指陳其時日軍憲兵隊內的華人通譯協助指認華人為抗日分子或馬共成員。這些華人通譯狐假虎威的欺凌，帶來的驚嚇縮影為通譯點頭指認，受害人背上被註記就難逃厄運。管震民的見證和指控，並非伸張民族大義的撻伐，恰恰描述這些青年學子和教師，「犢子偏遭獠犬傷，無情縲綆肆摧戕」，那是「不可活的生命」（unliveable lives）或「缺少可悲傷性」（ungrievable）的生命的紀錄，為最終殉難師生的集體犧牲，指出他們生命的脆危、渺小和羸弱，這是戰爭或迫害的創傷記憶裡的認識論。⁴⁵ 尤其「鍾靈二字怕人知」極其傳神，銘刻1942年4月6日的大檢證創傷，及其深沈的震慄和驚恐。由此「焚坑之慘」可視為管震民紀實寫作的春秋筆法，至少

⁴³ 管震民：〈檳嶼淪陷後，於壬午四月六日大舉肅清，焚坑之慘更不忍聞，聊賦四絕以誌餘痛〉，《綠天廬吟艸》，頁7。

⁴⁴ 這個觀點，在戰後復興初期已見諸該校師生的論述。參見張叔英：〈鍾中復興簡史〉，《鍾靈中學季刊（復興特號）》，1946年12月，頁14。管震民：〈鍾靈中學史略〉，《鍾靈中學季刊（復興特號）》，1946年12月，頁50-51。

⁴⁵ 參見李有成對Judith Butler的暴力與戰爭底下生命狀況的討論。李有成：《記憶政治》，頁37-38。

為這群被迫害，以至犧牲的師生，留下一個足以召喚創傷記憶的深刻意象。而現實的對應，則包括日據以後，日本軍政支部指示教育廳，要求各書店將中文書籍送檢，最後下令除地圖字典之外，全部付之一炬，計有20餘萬冊。焚書類同撲滅華文，尤其日據期間重新開辦的學校一律只能日語授課，禁絕母語教學，教師需參加日語訓練班。⁴⁶ 在個體和母語教育的生存危機裡，詩裡的「坑儒」帶有知識人的歷史悲愴，在這肅清抗日分子的行動裡，鍾靈中學師生的遇難，在某個程度上象徵了戰前華人教育和知識分子的斷絕。若從詩人與戰爭、暴力記憶的糾葛和倫理著眼，「鍾靈」在詩裡顯然被昇華為一種受難的華人主體和精神，以「華文」情結鑲嵌為華人歷史記憶的一部分。

在倖存者的記憶書寫裡，鍾靈師生殉難的背景，離不開「漢奸」的指認和告密。《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的內容雖是哀悼紀念，卻不忘控訴。書中記載每位教師殉難經過，尤其點出鍾靈教師管亮工、簡德輝（?-1942）、查企唐（?-1942）受到漢奸黃開聰、⁴⁷「台籍人巫廷謙妻指交日憲，逮捕入獄」。⁴⁸ 汪開競寫來更是直露：

一位著名的台籍婦人——本城市民給她一個綽號，叫她「無常」因為她是「巫」廷謙醫生之妻——對憲兵部說：「要捉共產黨，只要捉鍾靈先生好了」好像「無常」特別仇恨鍾中，一提到它便咬牙切齒，似有不共戴天之仇般的。……先由「蒙面人」指認，毫無所獲；這樣本可完事了，不知從什麼地方忽然跳出那個「無常」來，她大聲喊道：「你們鍾靈中學的教

⁴⁶ 吳體仁：〈淪陷時期的檳城教育〉，收於許雲樵原編、蔡史君編修：《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1984年），頁524-525。

⁴⁷ 原為實報主編，出身鍾靈，抗戰時入讀延安抗戰大學，後返檳城成為漢奸，但在日本投降前被人帶走，從此下落不明。謝詩堅：〈日本戰犯罪行罄竹難書——檳城人被六個蒙面人害慘〉，《東方日報》，2016年3月16日，網址：<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16/03/16/131421>，檢索日期：2021年5月9日。

⁴⁸ 〈殉難教師遺像及小史〉，收於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編：《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頁9-12。

員學生都走出來，假如隱匿不來，停會被指認出來，你們都死」！⁴⁹

在倖存者的記憶裡，他們以「閻王」和「無常」來稱呼日本憲兵部的日軍和通譯員，顯然審問過程往往是九死一生或離死亡很近。另外，鍾靈教師黃霜仁（1910-1997）在檳城第二次大檢證裡入獄，獄中的審問和刑求，依然不乏臺灣人。⁵⁰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有臺灣人背景的「漢奸」，其實早在戰前就是往返臺灣與新加坡、檳城等地的生意人，其中巫氏家族多人在馬來半島經營橡膠種植、開立藥房、診所等。1931年巫廷謙偕同妻子許玉葉（?-1976）到檳城從事醫療工作，而妻子卻在檳城淪陷時期成了日軍憲兵隊的通譯。1942年4月6日的大檢證，許玉葉指認了鍾靈師生，而烙印在日軍侵略戰爭的協力者名錄。在受害華人眼中，同屬華人的許玉葉自然是「漢奸」。⁵¹ 戰後許玉葉淪為戰犯，卻逃過當地英軍審判，而在1947年從新加坡潛逃日本，再返回到臺灣後被國民政府的軍事法庭以「共同濫用集體拘捕罪」判刑

⁴⁹ 汪洋：〈鍾靈中學員生殉難記〉，收於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編：《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頁25-26。

⁵⁰ 黃霜仁：〈我怎樣渡過難關〉，收於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編：《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頁33-34。臺灣人為日本憲兵指證華人為共產黨，還見於其他見證者的回憶。諸如理髮師Tan Kwai Khin於1942年4月6日的見證。參見Barber, *Penang at War 1914-1945*, 94-95.

⁵¹ 戰後由倖存者發出的指控尤其激烈。鍾靈中學校長陳充恩甚至透過中華民國駐檳榔嶼外館，要求中華民國政府在巫氏夫妻返回原籍時予以扣押嚴辦，指控他們在馬行醫實則間諜，而許玉葉為日本憲兵部翻譯，並指引逮捕鍾靈師生。相關參見〈海外台僑處理／鍾靈中學呈以台籍漢奸巫君夫婦陷害抗日僑生請予轉呈依法嚴辦並附榮哀錄一冊到館檢同附件并呈核辦案〉，外交部檔號：A303000000B/0035/075.3/1/001/021，1947年3月31日，國家檔案資訊網，網址：<https://aa.archives.gov.tw/ELK/SearchDetailed?SystemID=MDAwMDM4MTE3NA>，檢索日期：2021年5月9日；〈漢奸巫廷謙夫婦通緝／為飭屬查明監視巫員及其妻許員行蹤具報〉，外交部檔號：A301010000C/0036/058/53/1/002，1947年3月31日，國家檔案資訊網，網址：<https://aa.archives.gov.tw/ELK/SearchDetailed?SystemID=MDAwMDM2ODgzNA>，檢索日期：2021年5月9日。

十年。⁵² 這些臺籍戰犯的際遇，指出了鍾中師生殉難背後，日軍與漢奸在共犯結構上的歷史弔詭性。這類戰爭仇恨和記憶，出沒於倖存者的紀錄，構成華人淪陷時期的情感記憶（emotional memory）。

嚴格說來，倖存者回憶裡帶有紀實意味的指控，曝顯箇中的情感性傷害多少源自於華人與華文共生的情結。彼時南來文士、教師組成新馬華人社會知識階層的建制，以華校和報社為代表。鍾靈師生殉難，似集體以坑儒之姿，消亡和折損於另一通敵的南來華人手上。學者藍適齊點出日軍的臺灣人通譯與受難華人的箇中矛盾，在於通譯與當地華人共有的中國南方籍貫的地緣基礎。尤其通譯使用中文姓名（而非皇民化後的日本姓名），戰後輕易被辨識和指認為戰犯嫌疑人，這是因為臺灣人與當地華人都通曉中國南方方言（歷史文件裡，擔任通譯的臺灣人用了跟當地華人相似的閩粵方言拼音的英文名字）。因此，當地華人既是犯罪受害者與臺籍戰犯審判的指控者，促成高比例的臺籍通譯遭到審判。⁵³ 但不能忽視的是，這印證了長期以華人身分生活在華人移民社會的臺灣人，在戰時搖身變為通敵者，通曉日文且協助指認華人抗日分子，既是戰爭傷害，亦是對當地華人民族性的背叛和劃清界線。鍾靈師生被捕遇害，箇中難言的悲情，自然包括在動盪時刻被日常化的集體拒斥和懼怕。汪洋如此描述：

鍾中員生被捕的消息傳出後，社會上談虎色變；在敵人刺刀下，商店開始拒用有「鍾中」招牌的職員，已用的紛紛解雇。就是我們自己，行動也得格外仔細。⁵⁴

⁵² 鍾淑敏：〈二戰時期臺灣人印度集中營拘留記〉，《臺灣史研究》第24卷第3期（2017年9月），頁110-112。相關報導見〈由星潛逃戰犯巫廷謙先逃日卒在基隆就捕〉，《南洋商報》第5版，1947年7月12日。〈許玉葉判刑十年〉，《南洋商報》第1版，1947年10月17日。

⁵³ 藍適齊：〈口譯之「罪」〉，收於賴慈芸主編：《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臺北：聯經，2019年），頁324-328。

⁵⁴ 汪洋：〈鍾靈中學員生殉難記〉，收於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編：《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頁26。

管震民詩裡的「跬步不離防觸阱，鍾靈二字怕人知」，⁵⁵ 如實刻劃了三年八個月作為鍾靈師生的悲慘日子。

鍾靈中學在戰後編纂的《榮哀錄》，固然凝聚師生倖存者、見證者「勿忘歷史」的記憶，但歷史悲劇裡的創傷與記憶糾葛，往往投射為「一股荒涼的悲痛措手不及的占據」，付諸文字後，「那份記憶將繼續迫害他們，無法被理解的煎熬」。⁵⁶ 不少倖存者的記述是被動的寫作，或被敦促或下定決心留下記錄，其交織著恐懼經驗無法如實傳遞的困難。除此，書中亦可見青年學子抱持「仁慈的兩顆原子彈」的復仇情緒，⁵⁷ 「把蒙面走狗無恥奴才無恥之徒肅清」⁵⁸ 的記恨和洩憤，以及「沒有出賣良心」的自我檢視和伸張。⁵⁹ 由此可見《榮哀錄》催生了各種個別化的記憶，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歷史。

相對於《榮哀錄》的創傷記憶和鳴冤，管震民作為受難者家屬，他見證的鍾靈苦難，投射了教育／斯文斷續的恐懼和危機。他在戰後一系列的舊詩、祭文、碑序的寫作，聚焦為時代的傷逝，以及華教創傷的一個原型。1946年2月28日，鍾中的追悼會上，他撰述〈追悼會歌〉，哀婉淒切的歌詞，為檳城華教歷史刻下犧牲的意志。

聽哀悼樂聲悠揚，哀輓聯幛掛滿會場。

安眠吧，看日落東洋。我中華民國大放榮光。

⁵⁵ 管震民：〈檳嶼淪陷後，於壬午四月六日大舉肅清，焚坑之慘更不忍聞，聊賦四絕以誌餘痛〉，《綠天廬吟艸》，頁7。

⁵⁶ 卡爾維諾：〈一本關於死亡營的書〉，轉引自李有成：《記憶政治》，頁36。

⁵⁷ 張家榮：〈目睹的「揚州十日」〉，收於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編：《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頁36。

⁵⁸ 周勤才：〈悼同學時想到走狗的活躍〉，收於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編：《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頁36。

⁵⁹ 張石城：〈我的良心尚在〉，收於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編：《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頁37。林鵬子：〈由敵人的肅清想到自我的檢舉〉，收於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編：《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頁37-38。

敬為我們殉難師生謹掬心香，在鐵蹄下為教育而犧牲。
還有豐碑青史永留姓氏芬芳，魂兮歸來同鑒此哀藏。⁶⁰

然而，更為動人心魄的，還是他先後於1946年春天撰述〈鍾靈中學追悼殉難師生祭文〉、〈鍾中殉難師生紀念碑序〉二文，駢文體式，字句鏗鏘，有國仇家恨之控訴，有蒙難師生的追懷，最為特殊之處，在於奠定了華教與民族精神一體張揚的基礎。1946年鍾靈校方舉辦的追悼會上，唱〈追悼會歌〉，頌讀祭文，悼念四年前大檢證裡殉難之師生。祭文本色哀悼，在排比對仗的文辭裡，管震民細數師生遇害的前因後果，不忘提出鍾靈貫徹「愛國觀念，昕夕不忘。縮衣節食，視為經常。凡逢賑災，慨解義囊」，⁶¹ 這是彼時南洋華人響應祖國抗日的背景。接續娓娓道出日軍南侵圖謀大東亞霸業對華校之摧殘，以及加諸文人師生之暴力：

摧殘華校，逮捕文人。我校師弟，有口難伸。奚啻百數，縲絏羈身。迨入囹圄，逼供承招。火灼水灌，種種科條。慘無人道，鬼哭神號。焚坑之慘，罄竹難描。嗟我多士，鍾中錚錚。文才武學，遐爾蜚聲。……倭寇視之，更若仇讎。鞭笞拷撲，不問情由。活埋瘦斃，暴骨山坵。人神共憤，天地為愁。……幾聲原子，底定扶桑。不自度德，宜致滅亡。家仇國恥，一舉肅清。復興鬻宇，眷念前情。……⁶²

祭文原初是奠祭逝者，然而，管震民的寫作已是「祭而兼讚」，甚至具有批判和控訴精神，文內訊息的接受者，已擴及逝者以外之「生者」，或是對逝者及相關背景並不瞭解的「讀者」。柯慶明在析

⁶⁰ 管震民：〈追悼會歌〉，收於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編：《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頁21。

⁶¹ 管震民：〈鍾靈中學追悼殉難師生祭文〉，《綠天廬詩文集》（文鈔）（檳城：綠天廬，1955年），頁22。

⁶² 管震民：〈鍾靈中學追悼殉難師生祭文〉，《綠天廬詩文集》（文鈔），頁23。

論「祭」文之美感特質時，提及當「隱含讀者」（the implied reader）列為考量，儀式性的「告語」就轉化而擴張為包含有「祭」、「奠」、「讚」、「哀」等複雜內容，兼具「文學作品」性質的寫作。⁶³ 這就不難理解，管震民的祭文是「祭故舊」，亦自此基礎上，展現令人震驚而沉思的戰爭創傷，進而導入令人「發憤」感動的「華教」經驗，近乎華人文化存續的本質。

接續同一套語序和精神，管震民為殉難師生紀念碑寫的碑序，以碑石基座為載體，作為歷史記憶之傳遞，足以實踐其永恆性的傳播效果。碑序再次重申彼時鍾靈師生「愛國之熱忱，自始至終誓為後盾，前呼後應，敢作先聲。由華校而言，以我校為最，而日敵視之，則恨之刺骨」，往下則銘記戰時傷痕：

迨偷渡重洋，首淪孤嶼，先毀最高之學府，大捕無辜之師生。非稱元祐之黨人，即置東林之名籍，為一網打盡之計，用百般殘酷之刑，縲紲同羈，罪非公治，焚坑重演，毒過嬴秦，鬼哭神號，人天共憤，暴屍露骨，魂夢何安？為教育而捐軀，豈生人所逆測乎？噫！幾聲原子，三島為墟，國恥家仇，共洪流而逝東海，成仁取義，泐貞石而樹中庭，何殊血食千秋，永保馨香於勿替，且慰魂遊萬里，長留姓氏以同芳。⁶⁴

祭文與碑序二文並觀，皆以華教之創傷記憶為核心精神，故而「焚坑重演，毒過嬴秦，鬼哭神號，人天共憤，暴屍露骨，魂夢何安？」，銘刻的是教育者的犧牲，已是家國民族存亡旦夕的一縷英魂。相同的意象寫入詩歌、祭文、碑序，環環相扣恰似一組複沓再三的哀鳴曲。這是帶有文學性的華教記憶標的，既有最直觀易感的創傷見證，又有指向性的記憶導引；既有自然的弔喪悼念，又有人為的敘

⁶³ 柯慶明：〈「弔」、「祭」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年），頁210-211。

⁶⁴ 管震民：〈鍾中殉難師生紀念碑序〉，《綠天廬詩文集》（文鈔），頁6。

事言志。這亦如諾拉所宣稱的，記憶之場的雙重性，是屬於直接經驗中的對象，又是最為抽象的創作。尤其不能忽視作為「記憶之場」而共存的三層意義：實在的、象徵性的和功能性的場所。⁶⁵ 碑座落於鍾靈中學的實在場域，因其象徵性而成為記憶場所。祭文、碑序的功能性意義，也因為成為儀式性的對象而進入記憶之場。每年馬來西亞華社奠祭二戰罹難同胞的紀念活動，象徵性的召喚起同屬淪陷傷痕的鍾靈師生殉難記憶，以及華教傷痕。

因而鍾靈師生殉難／鍾靈中學的記憶之場，影響了從戰前延至戰後的華人教育認同和文化意識形態。管震民以鍾靈中學國文科主任和教師之資歷，眼看日寇摧殘華校，文脈之斷絕，凸顯了那一代南來文人的哀傷。秦朝焚書坑儒描述斯文遭致摧殘的慘劇。碑序刻印著日軍占領期間的暴政惡行，同時悼念了一代知識青年的斷傷，以及檳島華人文化的腰斬。〈蘭亭集序〉所言：「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⁶⁶，紀念碑序要為鍾靈師生殉難建立一個後世觀覽的精神：華校是為華社的一線斯文，華校之師生，自有其賡續文化命脈的使命和義務。這是鍾靈師生殉難嵌入檳城歷史記憶的關鍵環節，亦是作為檳城和大馬華教的記憶標的。

環繞鍾靈師生殉難傷痕的寫作，往往張揚傷逝與重生的拉鋸。管震民的舊詩所形構的文學性線索，透過創傷記憶的凝聚，展示了華教——鍾靈的共生。

摧殘文化首鍾靈，師弟何辜受慘刑。九死一生云萬幸，寥寥有幾若晨星。⁶⁷

⁶⁵ 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主編，黃艷紅等譯：〈記憶與歷史之間：場所問題〉，《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頁20。

⁶⁶ 王羲之：〈蘭亭集序〉，收於張素卿等選注：《歷代散文選注》下（臺北：里仁書局，2009年），頁619。

⁶⁷ 管震民：〈迴憶四絕〉之二，《綠天廬吟艸》，頁68。

另外，昔日鍾中舊同事謝松山控訴日侵與記載戰犯受審的《血海》（1950）出版，管寫作序文並題詞，召喚的依舊是鍾中歷史傷痕。

最高學府說鍾靈，慘受犧牲亦最深，師弟標名同抗日，百餘骸骨向何尋？

崇碑峙立在鍾中，殉難師生報國忠，試聽一聲原子彈，降旗早豎海天東。⁶⁸

然而，教育乃百年樹人之事業，《榮哀錄》編纂的最終期許是「興邦教育基童穉，轉瞬群才雪宿冤」（〈書鍾中殉難師生哀榮錄〉，頁52）；學校復興，校刊隨之復刊，帶動的氣象是「墜緒何妨搜漢學，新潮終不受秦焚」，⁶⁹鍾中從歷史血淚與傷痕裡轉向復興，成了文化記憶的一部分。1947年12月8日鍾靈中學舉行殉難師生紀念碑揭幕典禮，管震民再次以詩寄存歷史：

豐碑八尺立堂楹，石實金貞勒姓名。師弟有知魂亦慰，精神不朽死猶榮。南風復譜菁莪什，東海惟聞嗚咽聲。大好健兒須取，強權圖霸業難成。⁷⁰

透過詩句，最能看出其時知識界如何重塑鍾靈師生殉難跟華人民族事業為一環的重要抒情表述。因而紀念碑存續的歷史記憶，伴隨哀歌，強化了檳城華人去認知這一場戰爭與華教的內在關係。詩與史的寫作倫理，在此獲得一種調和及撫平。

⁶⁸ 管震民：〈題詞〉，收於謝松山：《血海》（新加坡：南洋報社有限公司，1950年），頁25。

⁶⁹ 管震民：〈鍾中校刊復刊紀念〉，《鍾靈中學季刊（復興特號）》，1946年12月，頁45。

⁷⁰ 管震民：〈鍾靈殉難師生紀念碑揭幕書感〉，《綠天廬吟艸》，頁59。

四、結語

諾拉於1984-1992年集合眾多學者編輯七卷本的《記憶之場》，透過不同文本，物質性與非物質性，包括傳說、概念、紀念性建築物和活動、領土、國家、遺產、傳統等項目，開啟關於記憶與歷史的思辨。這個由諾拉創造的「記憶之場」，由場所（lieu）和記憶（mémoire）兩個詞構成，有論者指出此概念含糊曖昧，以及無限外延，欠缺理論化，歷來不無詬病之處。⁷¹ 但「記憶之場」可供具體操演的概念至少有兩個層面。一是以具體可感的定義，就是那些上演著紀念行為的有形場所。⁷² 另一層面則強調其作為記憶裝置，一種位置記憶，展現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色彩。⁷³

就以上兩個層面，鍾靈中學殉難師生的創傷記憶，跟華人與華教的脈動緊密相聯。抗日援華和淪陷創傷構成了新馬華人在1940年代以來，相當長時段的民族和文化意義上的情感性認同，就此而言，檳城和鍾靈中學就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和決定性意義的記憶之場。這裡的記憶之場，意義不在於具體化的場所，而是帶有定錨意義。其標記的是災難性事件倖存者的參照點，也是事件發生後很久才出生者的參照點。⁷⁴ 從後記憶的觀點而言，後面世代唯有透過記憶之場去追索前人記憶，甚至鍾靈師生殉難即成為一個隱喻，透過文化和文學性的創傷形塑，華教與華人的犧牲占據了一個民族精神的崇高道德位置。

⁷¹ 阿斯特莉特·埃爾：〈文化記憶研究導論〉，收於阿斯特莉特·埃爾、安斯加爾·紐甯主編：《文化記憶研究指南》（南京：南京大學，2021年），頁13。

⁷² 杰伊·溫特：〈記憶之場與戰爭陰影〉，收於阿斯特莉特·埃爾、安斯加爾·紐甯主編：《文化記憶研究指南》，頁61。

⁷³ 皮爾·鄧布爾：〈位置記憶——記憶之場〉，收於阿斯特莉特·埃爾、安斯加爾·紐甯主編：《文化記憶研究指南》，頁19-32。

⁷⁴ 杰伊·溫特：〈記憶之場與戰爭陰影〉，收於阿斯特莉特·埃爾、安斯加爾·紐甯主編：《文化記憶研究指南》，頁80。

戰後鍾靈中學走過傷痕的紀念和復校，學校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和支持，籌募經費也獲得華社熱烈支持。⁷⁵ 這裡被動員的精神，指向教育是華人的文化與身分堡壘。華教，被鞏固為一種民族意識，並帶有創傷根源（淪陷期間的被指控、被認定、被殺害）。這個教育立場和思想很牢固的延續至1950年代種種政治與教育政策的變局。彼時政治動盪，鍾靈中學面臨陳充恩校長、陳宗嶽（1890-1951）等教師被暗殺；1956年接受政府津貼，改制為「鍾靈國民型中學」，英文成了教學媒介語，成為全馬第一間接受改制的華校。隔年學運風起雲湧，串連起全國學潮，學生領袖被開除、拘捕和入獄不在少數。⁷⁶ 英殖民政府對華文教育的干涉有多重因素，英殖民當局的反共、美蘇文化冷戰的思維和政策貫徹，華人、華校與華文教育成了反共戰場。⁷⁷ 由此觀之，在一個政治意識形態角力的大環境下，彼時「愛吾華文，愛吾鍾靈」的血書口號印記在華校生為華教鬥爭的民族認同與政治熱情，鍾靈中學在華教運動占據了一個不可取代的歷史位置，雖不乏帶有反英殖民主義、左翼思想意識，⁷⁸ 卻凸顯了從淪陷創傷、戰後復辦以降

⁷⁵ 汪開競如此描述：「抗戰勝利以後，社會上對鍾中突然注意起來。教員受人尊敬，學生被人羨慕，籌募經費，大家爭先恐後，這是很好的現象，但造成今日鍾中的地位，我們卻不能忘記這是過去三年八個月中許多殉難師生的大量流血所致。」參見汪洋：〈鍾靈中學員生殉難記〉，收於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編：《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頁23。

⁷⁶ 值得注意的是，學運訴求的重點之一，是新的教育法令規範華校不能收超齡學生。然而，二戰淪陷期間失學的年輕人甚多，這一驅逐超齡生的政策，除了有教育平等的爭議，當然更是殖民當局防堵超齡生因其年紀和社會經驗，更容易投入反殖民運動或左翼運動，而必須針對華文教育學生群體進行管制。參見楊泉：〈五十年代華校學運的定位及其背景〉，收於鄭文波等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學生運動史料匯編：紀念1957年“11.14”全國華校學潮五十周年》（馬來西亞：全馬華文中學捍衛華教運動五十週年工委會，2010年），頁363-369。

⁷⁷ 參見王琛發：〈馬來亞冷戰陰影下的風雨聲、讀書聲與罷課聲〉，收於鄭文波等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學生運動史料匯編：紀念1957年“11.14”全國華校學潮五十周年》，頁379-398。

⁷⁸ 關於鍾靈中學接受改制、引發全國學運的文獻紀錄，可參見鄭文波等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學生運動史料匯編：紀念1957年“11.14”全國華校學

的華校傳統和母語教育情結。這一切促成了華人社會對華文教育和華人文化有了更深的體認，而其時馬來亞正邁向國家獨立的進程。

鍾靈師生殉難的「記憶之場」，攸關華文與華教精神發展的軌跡。但後世不再經歷前面世代的苦難與創傷，記憶總是處於演變之中。殉難師生紀念碑依然矗立在「鍾靈國民型中學」校內正門，而董事部於1962年復辦了「鍾靈私立中學」，1976年正名為「鍾靈獨立中學」。1986年國民型的「北海鍾靈中學」正式跨海開辦。這些擴校的發展，似乎已無關那一場留在歷史裡的傷痕記憶。但鍾靈師生殉難的記憶之場，依然跟公共紀念活動連結，以不同的紀念儀式激活。1995年8月15日，三校董事會聯合大馬鍾靈校友會總會挑選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日，在殉難師生紀念碑前舉行追悼會。2002年，接續舉辦陳充恩校長遇難50周年追思會。2007年慶祝建校90周年紀念，開放鍾靈文物館，對外展示那一段鍾靈中學二戰時期的傷痕與榮耀。百年校慶之時，因應時代傳播，建設了「鍾靈百年記事」網站。

在大馬華校發展史上，鍾靈中學的獨特性，不能忽視老輩校友的長年堅持。校友會出版聯繫校史與華教史的校慶特刊，完整承載了記憶之場的論述與建構。尤其近30年內的特刊，基本環繞在紀念戰前戰後的教師，以及校史發展、華文教師事蹟、師生抗日運動、改制與學潮等等對當前世代幾近陌生和遺忘的歷史記憶。⁷⁹ 老輩校友的執著論

潮五十周年》、檳州學運史料匯集編委會編：《檳州學運史料匯集》（檳城：檳州學運史料匯集編委會，2010年）。關於1950年中期的華校學運，張景雲以愛校運動、華教運動、反殖運動和左翼運動四個面向總結其時代意義。參見張景雲：〈打撈五十年代華校學運的集體記憶〉，收於鄭文波等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學生運動史料匯編：紀念1957年“11.14”全國華校學潮五十周年》，頁i-viii。

⁷⁹ 近30年的校慶特刊，參見馬來西亞鍾靈校友會總會主編《鍾靈師生紀念文集》（1997）、陳榮照主編《檳城鍾靈中學校史論集》（2007）和檳城鍾靈中學董事會主編《檳城百年鍾靈校史》（2017）。但後兩本的特刊，已有幾篇重複的論文，重要的論述者基本是王慷鼎、葉鍾鈴、陳榮照、陳聞察、陳是呈等人，他們都是鍾靈中學校友，當中不乏重要的文史學者，對校史的熱衷和探究自有其重要貢獻。

述，回顧了他們自身經歷的華教歲月，不忘為歷史記憶的傳遞框架奠定了基礎。鍾靈師生殉難事件因而是新馬華人歷史和文化中的記憶之場，亦是一座人文精神的紀念碑，紀念著暴力迫害下堅毅不屈的思想和靈魂。

徵引書目

- 〈由星潛逃戰犯巫廷謙先逃日卒在基隆就捕〉，《南洋商報》第5版，1947年7月12日。
- 〈殉難教師遺像及小史〉，收於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編：《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檳城：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1947年，頁9-12。
- 〈海外台僑處理／鍾靈中學呈以台籍漢奸巫君夫婦陷害抗日僑生請予轉呈依法嚴辦並附榮哀錄一冊到館檢同附件并呈核辦案〉，外交部檔號：A303000000B/0035/075.3/1/001/021，1947年3月31日，國家檔案資訊網，網址：<https://aa.archives.gov.tw/ELK/SearchDetailed?SystemID=MDAwMDM4MTE3NA>，檢索日期：2021年5月9日。
- 〈許玉葉判刑十年〉，《南洋商報》第1版，1947年10月17日。
- 〈漢奸巫廷謙夫婦通緝／為飭屬查明監視巫員及其妻許員行蹤具報〉，外交部檔號：A301010000C/0036/058/53/1/002，1947年3月31日，國家檔案資訊網，網址：<https://aa.archives.gov.tw/ELK/SearchDetailed?SystemID=MDAwMDM2ODgzNA>，檢索日期：2021年5月9日。
- 〈檳城鍾靈中學近況〉，《僑務月報》第3期，1936年。
- 王世毅：〈鍾中教員殉難記〉，《中華公報》，1945年11月28日。
- 王琛發：〈馬來亞冷戰陰影下的風雨聲、讀書聲與罷課聲〉，收於鄭文波等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學生運動史料匯編：紀念1957年“11.14”全國華校學潮五十周年》，馬來西亞：全馬華文中學捍衛華教運動五十週年工委會，2010年，頁379-398。
- 王慷鼎：〈文采風流的華文教師〉，收於陳榮照編：《檳城鍾靈中學校史論集》，新加坡：鍾靈中學（新加坡）校友會，2007年，頁110-164。

- 王慷鼎：〈董教學三位一體的抗日運動（1937-1945）〉，收於陳榮照編：《檳城鍾靈中學校史論集》，新加坡：鍾靈中學（新加坡）校友會，2007年，頁284-363。
- 王羲之：〈蘭亭集序〉，收於張素卿等選注：《歷代散文選注》下，臺北：里仁書局，2009年，頁619-625。
- 甘德政：《我們是誰？中英博奕與馬來亞華人的身份認同》，吉隆坡：Kam De Zheng，2016年。
- 皮耶·諾哈（Pierre Nora）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臺北：行人文化，2012年。
- 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主編，黃艷紅等譯：《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 皮爾·鄧布爾：〈位置記憶——記憶之場〉，收於阿斯特莉特·埃爾、安斯加爾·紐甯主編：《文化記憶研究指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頁19-32。
-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著，何磊譯：《戰爭的框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
- 辻政信：《東方直布羅陀爭罷戰：日本如何完勝大英帝國》，臺北：燎原出版，2020年。
- 吳體仁：〈淪陷時期的檳城教育〉，收於許雲樵原編、蔡史君編修：《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1984年，頁524-525。
- 李有成：《記憶政治》，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20年。
- 李業霖主編：《奉納金資料選編》，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0年。
- 汪洋：〈鍾靈中學員生殉難記〉，收於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編：《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檳城：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1947年，頁23-29。
- 依藤：《彼南劫灰錄》，檳城：檳城鍾靈中學，1957年。
- 周勤才：〈悼同學時想到走狗的活躍〉，收於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

- 會編：《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檳城：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1947年，頁36。
- 杰伊·溫特：〈記憶之場與戰爭陰影〉，收於阿斯特莉特·埃爾、安斯加爾·紐甯主編：《文化記憶研究指南》，南京：南京大學，2021年，頁61-94。
- 林立：〈亦詩亦史：描述新加坡日佔時期的舊體詩集《血海》〉，《清華學報》新47卷第3期，2017年9月，頁547-589。
- 林水椽、駱靜山編：《馬來西亞華人史》，雪蘭莪：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1984年。
- 林鵬子：〈由敵人的肅清想到自我的檢舉〉，收於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編：《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檳城：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1947年，頁37-38。
- 阿斯特莉特·埃爾：〈文化記憶研究導論〉，收於阿斯特莉特·埃爾、安斯加爾·紐甯主編：《文化記憶研究指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頁1-19。
- 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編：《大戰與南僑》，吉隆坡：隆雪中華大會堂，2007年。
- 柯慶明：〈「弔」、「祭」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年，頁205-297。
- 張少寬：《檳榔嶼翰墨緣》，檳城：南洋田野研究社，2017年。
- 張少寬：《檳榔嶼舊聞》，檳城：Federation of Ka Yin Chu Association of Malaysia，2016年。
- 張石城：〈我的良心尚在〉，收於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編：《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檳城：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1947年，頁37。
- 張叔英：〈鍾靈中學師生蒙難記〉，《申報》，1945年11月26日。
- 張家榮：〈目睹的「揚州十日」〉，收於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

- 編：《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檳城：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1947年，頁36。
- 張叔英：〈鍾中復興簡史〉，《鍾靈中學季刊（復興特號）》，1946年12月，頁13-17。
- 張景雲：〈打撈五十年代華校學運的集體記憶〉，收於鄭文波等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學生運動史料匯編：紀念1957年“11.14”全國華校學潮五十周年》，馬來西亞：全馬華文中學捍衛華教運動五十週年工委會，2010年，頁i-viii。
- 張景雲：〈碧瀾風雅遺韻長〉，收於張少寬：《檳榔嶼翰墨緣》，檳城：南洋田野研究社，2017年，頁X-XXVI。
- 郭仁德：《馬新抗日史料：神秘萊特》，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
- 陳 達：《浪跡十年之閩粵、南洋記聞》，香港：香港中和出版，2021年。
- 陳少蘇：《生春堂集》，檳城：檳城鍾靈中學校友會，1947年。
- 陳次亮：〈南洋論〉，收於張煜南輯：《海國公餘輯錄》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144-145。
- 陳次亮：〈酌增領事說〉，收於張煜南輯：《海國公餘輯錄》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160-163。
- 陳榮照：〈春風化雨四十年：鍾靈1917-1957〉，收於陳榮照編：《檳城鍾靈中學校史論集》，新加坡：鍾靈中學（新加坡）校友會，2007年，頁1-45。
- 陳翼經：〈檳州百年來的教育〉，《檳州華人大會堂慶祝成立一百週年·新廈落成開幕紀念特刊》，檳城：檳州華人大會堂，1983年，頁398-405。
- 黃國良：〈後記〉，收於陳榮照主編：《檳城鍾靈中學校史論集》，新加坡：鍾靈中學（新加坡）校友會，2007年，頁451-452。
- 黃霜仁：〈我怎樣渡過難關〉，收於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編：

- 《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檳城：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1947年，頁32-35。
- 楊 泉：〈五十年代華校學運的定位及其背景〉，收於鄭文波等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學生運動史料匯編：紀念1957年“11.14”全國華校學潮五十周年》，馬來西亞：全馬華文中學捍衛華教運動五十週年工委會，2010年，頁363-369。
- 葉鍾鈴：〈檳城華僑機工回國服務紀實〉，收於陳劍虹、黃賢強編：《檳榔嶼華人研究》，檳城：韓江學院華人文化館，2005年，頁307-326。
- 葉鍾鈴：《陳嘉庚與南洋華人論文集》，吉隆坡：馬來西亞陳嘉庚基金工委會，2013年。
- 葉鍾鈴：《檳城鍾靈中學史稿（1917-1957）》，新加坡：華裔館，2009年。
- 廖小菁：〈近代南洋的孔教運動與華文教育：以檳榔嶼孔聖廟中華學校為中心的考察（1904-1923）〉，收於呂妙芬、康豹編：《五四運動與中國宗教的調適與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0年，頁193-236。
- 管震民：〈追悼會歌〉，收於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編：《檳城鍾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檳城：鍾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會，1947年，頁21。
- 管震民：〈鍾靈中學史略〉，《鍾靈中學季刊（復興特號）》，1946年12月，頁47-53。
- 管震民：《綠天廬吟艸》，檳榔嶼：管震民先生七秩榮壽紀念壽管委員會，1949年。
- 管震民：《綠天廬詩文集》（文鈔），檳城：綠天廬，1955年。
- 謝松山：《血海》，新加坡：南洋報社有限公司，1950年。
- 謝詩堅：〈日本戰犯罪行罄竹難書——檳城人被六個蒙面人害慘〉，《東方日報》，2016年3月16日，網址：<https://www.orientaldaily.com>

- com.my/news/mingjia/2016/03/16/131421，檢索日期：2021年5月9日。
- 謝詩堅編著：《檳城華人兩百年》，檳城：韓江學院韓江華人文化館，2012年。
- 鄭文波等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學生運動史料匯編：紀念1957年“11.14”全國華校學潮五十周年》，馬來西亞：全馬華文中學捍衛華教運動五十週年工委會，2010年。
- 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史》第一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1998年。
- 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史》第二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1999年。
- 鍾淑敏：〈二戰時期臺灣人印度集中營拘留記〉，《臺灣史研究》第24卷第3期，2017年9月，頁89-140。
- 檳州學運史料匯集編委會編：《檳州學運史料匯集》，檳城：檳州學運史料匯集編委會，2010年。
- 藍適齊：〈口譯之「罪」〉，收於賴慈芸主編：《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臺北：聯經，2019年，頁309-354。
- Barber, Andrew. *Penang at War 1914-1945*. Malaysia: AB&A, 2010.
- Tan, Chee Seng. “‘Sook Ching’ 1942 Dan Penglibatan Sekolah Menengah Chung Ling Pulau Pinang: Suatu Interpretasi Baru.” *Kajian Malaysia* 37, no. 1 (2019): 51-82.